

劉素林 李 偉

[美]弗里曼、畢克偉、塞爾登著，陶鶴山譯：《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學者在研究上世紀中期的中國土地改革時，往往徘徊於「革命」與「現代化」敘事的兩難困境。前者注重凸顯土地改革的積極意義，將土地改革描繪成世代受經濟盤剝和文化壓迫的農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詩事件；而現代化敘事體系則將土改放置於一個與世界緊密聯繫的視野中來審視，他們認為土改不但沒有實現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有效整合，反而使已經一蹶不振的農村社會秩序陷於混亂。革命范式與現代化範式在解釋同一歷史現象的時候何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斷？作出這種判斷的真實背景又是什麼呢？帶著疑惑與追問拜讀弗裏曼等人合著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掩卷思量，我禁不住為中國農村大地的波瀾跌宕、滄海桑田而感慨萬千。

本書作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畢克偉（Paul G. Pickowicz）、賽爾登（Mark Selden）分別為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教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批來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美國學者，他們從1978年開始在五公村、饒陽、石家莊等地進行調查、訪談，查閱相關資料。在近三年的時間裏，作者先後八次分赴饒陽和其他地區，進行了大量而細緻的田野作業，僅與當地的基層幹部、村民以及具有當地生活經歷的外地幹部、作家、記者、藝術家等的訪談時間就累計超過數千小時。作者還查閱了眾多的有關檔案等原始材料，這些資料包括五公村合作社老會計所保存的1940-70年代的原始帳本；饒陽縣當地幹部向上級彙報的黨內秘密報告；河北省檔案館館藏相關資料；北京國家圖書館、檔案館館藏相關資料以及臺灣檔案館收藏的民國時期華北農村的大量資料。對這些第一手資料的收集使整個研究工作建立在扎實的歷史文獻基礎之上。同時，作者不是簡單地羅列資料，停留在一般的敘述介紹之上，而是將五公村作為華北農村社會近代變遷中的一個典型，將其放在變動中的歷史中進行考察，運用各自學科的理論，探討這一變動過程中國家與社會、現時與歷史的互動關係，從而使本書既有一般敘事的可讀性，又有相當的理論深度。

和許多研究中國農村的著作一樣，本書深受西方學界現代化敘事模式的影響。作者以西方社會的價值體系為參照來對比中國農村發展的進程。全書以華北平原的饒陽縣五公村為個案，以五公村領頭人耿長鎖的生活軌跡為線索，深入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戰爭時期及革命勝利以後在農村社會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從減租減息到互助組、合作社，再到大躍進時的人民公社，分析了這先後進行的改革對農村社會及農民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對戰爭及國家建設的作用，它們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等，進而探討國家與農村社會，國家領導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在這本著作中，作者的著筆之處都不是一些宏大的事件，而是發生在鄉村社會的平常小事。正是在對這些小事的描述中，我們體味到作者建構理論的雄心，並分享了愉快與思考。

如在第七、八兩章中所描寫的合作化運動中耿長鎖社社員與外來勢力（工作組）之間的種種細節，作者實際上是通過這樣一些細節來反映當時情況下的一種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由於耿長鎖社是老區互助合作的先進典型，他們與國家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還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質。社員儘管對新體制的不滿情緒，但最終因為在發展中受到各級政府的種種特殊照顧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在描寫村民對國家預算體制的態度時，作者巧妙地提到：「一個人可以批評單個的壞蘋果，但不能批評在圍牆裏面的、生產壞蘋果的社會主義果園。」（第397頁）這種惟妙惟肖的論述在文中隨處可見，既讓人忍俊不止，又給人以閱讀愉快。所有這些文字都將人們從想像的農村引向了一個生動而真實的農村。

本書的中心內容之一是探討戰爭時期中共政權在華北農村根據地的社會動員。作者認為：在主導者中國共產黨眼裏，他們起初並沒有把土地改革當作是這類國家邁向現代化所必須經過的門檻，而是把土地改革歸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雖然中共在總的路線上規定了這種革命不同於「舊式民主革命」。但事實上，中國內戰時期的土地改革和稅收政策，是中共為了與國民黨爭天下進行社會動員的手段，而隨著戰事的烈度和規模急劇擴大，社會動員演變成功利性極強手段特殊的戰爭動員，所以，不論是抗日戰爭時的稅收、土地政策還是內戰期間的土地改革運動，都使中共獲得了戰爭動員的極大成功。在短時間內，激起了民族意識和階級仇恨，不但建立了群眾廣泛支持的根據地，同時也大大地加速了蔣介石從「民族抗戰領袖」墜落到「人民階級敵人」的過程，在戰爭最殘酷時期，使共產黨人獲得了人力物力的補充。正如作者在書中寫道的那樣：「他們忠心耿耿地為抗日服務，其中很多人和他們的孩子都入了黨，參了軍」；「戰爭期間，幾乎所有聚居區、宗族和經濟地位的人均在抗日愛國前提下團結一致，參加共產黨地下組織和八路軍。」（第81、124頁）對於在武器兵力和作戰技術上都處於劣勢的共產黨人來說，武器裝備上的極度劣勢迫使他們不得不採用「人海戰術」，將勇敢精神發揚到極點，而兵力的及時補充正是保持戰鬥力的關鍵因素。不僅如此，土地改革這種有效的社會動員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得共產黨人在士氣上也佔了上風，同樣主張「耕者有其田」的國民黨人，糊糊塗塗地就變成了土地改革的反對者，在宣傳上很是矮了一頭。以至於「舊國民黨縣政府殘餘和沒有南逃的各種獨立派組織，被吸收到由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機構中來。」（第62頁）中國共產黨以土改為支點，把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資訊輻射、傳遞給大眾的這個過程，強烈地塑造著農村人們的政治認知與價值取向，使大眾對其基層的社會動員表現出極大的認同與親和。也使得國民黨的基層政權最終為共產黨所置換，從而成為事實上基層農村的控制者。

由於作者將國家權力與村落社區的互動關係作為考察的主體框架，所以國家權力、國家話語向鄉村的滲透以及鄉村社會的反應成為了本書的重點。在論及改革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時，作者提出：「農民們按照宗族、宗教、村莊遺留下來的慣例和標準，以及包含在長期形成的習慣中的傳統規範來進行思考和行動。某些國家行為的不合理性和長期的非道德性使農民們進一步轉向傳統規範組織。多樣化的與自衛的農民整體和為了進攻傳統而試圖滲透到社會中引起衝突的國家機器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構成了農村生活的內容。」（第372頁）這一論斷事實上與杜贊奇在其著作《文化、權利與國家》中提出的權利的文化網路不謀而合。農村基層權力的運轉，是通過一系列文化傳統和習俗編制起來的文化網路來實現的。這種文化網路內涵豐富，包含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如宗族、祭祀、節慶、道德、教育等。農村舊有的權勢者就通過這種文化網路建立、鞏固和強化自己的影響力。所以作者認為：國民黨的對農村社會控制的努力之所以失敗，其原因是僅僅「與窮人的宗教信仰進行了微不足道的交鋒。它不能激起潛在的民族主義，農村處於分裂之中，傳統地方精英不再使社會結構保持完整」（第52頁）。中國共產黨的做法是對有形的土地進行再分配，粉碎舊有權力的物質基礎後，

還試圖消滅這種就有權力存在的文化基礎，徹底清除其影響。所以1946年中共中央下達了《五四指示》，正式提出了對特殊土地的解決問題。他們認為這樣有益於打破宗族地方封建關係，而且也使得宗族制度和勢力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遭到剷除。但作者認為這種做法的結果是使得新生政權文化價值觀與農民家庭經濟的合理性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大。並導致一些受到社會主義政權恩惠的人與所有其他人之間，以及在外來的社會主義觀念與農村合作社土生土長的根基之間裂痕的產生。而這種裂痕產生的原因則是土地改革改革了太多與土地無關的東西。比如對實際並不佔有多少土地的李建亭、李化歧等所謂土豪惡霸的打擊；對宗族、廟宇（河神廟）的毀滅；對農村社區的衝擊等等。加進了這些東西，就使得土地改革成為農村基層的一次奪權運動。不僅僅是形式上的國家對農村基層的正規化，而又要摧毀舊的基層政權賴以生存的文化權力網路，然後建立起新的文化權力網路來。這種改革實在是很艱巨的。我們看到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努力工作，可是它每一次取得的成果都無法突破頑強的農村文化網路，以至於不得不恢復到其原來的樣子。但共產黨人知道，要想牢牢控制住農村基層政權，就必須通過土地改革來實現對地主、劣紳、富農的打擊，以及對宗廟、祠堂的破壞，最終打亂了過去的鄉村文化網路。要把土地改革以後的鄉村重新整合起來，建立新的文化權利網路是必要的。耿長鎖合作社之所以能成為模範村以及耿長鎖本人之所以能成為勞動英模。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他們迎合了新政權重建了鄉村的網路的需要，接受了新權力秩序對農村的滲透。這表明中共嘗試放棄對鄉村社會的強力控制，改而試圖利用新的文化準則來實現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目的。這種做法使中共能夠以較小的社會代價換取自身合法性的迅速確立。

集體化與現代化也是本書討論的中心之一。在中國農村進入集體化時期，黨的領導人認為集體化模式既可以避免資本主義之弊病，又可以徹底改造小農經濟，使小農經濟走向現代化。事實證明，這一變革未能達到預期目的。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作者認為是由於嚴重扼制了個人選擇。因為「一種報酬制度倘把大多數的不勞而獲者與勤勞者放在一起，它就不能激起大多數人的生產積極性」（第228頁）。此外就農作制度本身而言，缺乏激勵必然造成低效率。集體化屬於一次性博弈，成員不能自由進入或退出，因而無法維持自我實施的協議，而由於成本過高又無法實施有效監督，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效率的低下。再者，國家政策阻礙了農業外就業機會的擴展。政府雖然把工業化作為目標，但在農村，卻極力限制農業以外的就業機會。由於政府權力的下延，對鄉村控制空前嚴密，這種限制非常有效。這樣，與以前相比，集體化時期個人選擇的自由度不僅未增加，反而縮減，嚴重束縛了農村經濟發展。可以說，集體化時期農業的不發展是制度因素造成的，是政策選擇的結果。「因此，集體化並不是促進和刺激農民家庭經濟的自然結果，而是一個經濟上代價極高、政治上異化的大斷裂。」（第385頁）

必須指出的是，本書也有一些不足之處。由於作者恪守現代化敘事的單一範式，因此評判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標準缺乏相應的變化，只是展現它們符合敘事邏輯的一面，而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另外一面的價值難以展現。此外，在借用西方社會經驗的發展理論作為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分析工具時，作者並沒有很好地做到西方社會發展理論與中國本土社會發展的有機結合。他們以五公村的具體史實為出發點，注重史料、故事與西方社會發展理論的結合，努力把對具體史實的認知提升到抽象理論的總結，但他們沒有很好地抓住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主題、主體、制度和路徑等方面的個性特徵，因而沒有提煉出一套基於近現代中國本土經驗的社會發展理論。

儘管如此，《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仍不失為一本研究中國農村的鴻篇巨制。其廣泛的

文獻搜集、生動的現象描述、深入的材料解讀、渾厚的理論構建不僅為我們研究中國農村提供了一個多重、立體的視角，也展示了學科之間相互交叉、相互貫通的美好前景。因此，凡從事社會史、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大可不必自視「邊緣」，學術的邊緣往往是希望的福地。

劉素林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社會史

李 偉 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社會史

---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四 八期 2006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四 八期（2006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